

RESEARCH OUTPUTS /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Multilingual famil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Van Mensel, Luk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ublication date:
2018

Document Version
le PDF de l'éditeur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lished version (HARVARD):

Van Mensel, L 2018, 'Multilingual famil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The language practices of three multilingual families in Brussels, Belgium.',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vol. 13, no. 1, pp. 65-77.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多语社会中的多语家庭

——布鲁塞尔三个多语家庭的语言实践

Luk Van Mensel¹

程京艳², 赵慧³ (译), 何山华⁴ (校)

(1. 鲁汶大学 文学院 比利时 鲁汶 B-3000; 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2; 3. 中国地质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4. 扬州大学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127)

提 要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 官方实行双语制 (荷兰语-法语), 实际上是一个多语化城市, 如今城中跨国家庭和多语家庭正日趋普遍。本文简要介绍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的语言生活, 对布城及周边 3 个 (语言) 背景迥异的多语家庭的语言实践进行了讨论。调查显示, 3 个家庭的内部交流方式均比他们自己宣称的要更为灵活多样。由此可见, 多语家庭的语言构成比当前社会对他们的现有分类要更加复杂和多维。

关键词 多语家庭; 语言实践; 家族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1-0065-13

Multilingual Famil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The Language Practices of Three Multilingual Families in Brussels, Belgium

Luk Van Mensel

Abstract In Brussels, the officially bilingual (Dutch-French) yet effectively multilingual capital of Belgium, transnational and multilingual families are becoming less and less exceptional.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inguistic situation in Brussels and Belgiu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nguage practices of three multilingual families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backgrounds, living in and around Brussels.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how these families, regardless of their linguistic background, develop ways of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at are far more dynamic and flexible than what they themselves claim to be doing. As a result, the linguistic make-up of these families is mor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than how it is presently being categorized by society.

Key words multilingual families; the language practice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21 世纪的西欧社会呈现出文化族群日益多样化的特点。布鲁塞尔, 作为比利时的首都, 也不例外。移民潮带来了大量世界各地的移民, 因此布鲁塞尔尽管官方实行双语制 (荷兰语-法语), 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多语城市 (Janssens 2013, 2015)。因为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 跨国和多语的家庭变得越来越

作者简介: Luk Van Mensel, 男, 比利时鲁汶大学文学院访问讲师, 那慕尔大学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 luk.vanmensen@unamur.be。

普遍。本文试图通过数个例子展示生活在布鲁塞尔及周边的3个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多语家庭的语言实践。首先介绍布鲁塞尔语言生活现状,然后简要回顾有关家庭多语状况的研究,尤其是家庭语言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如: King *et al.* 2008; Curdt-Christiansen 2013; Smith-Christmas 2016),最后具体探讨3个家庭的大致状况及其语言实践的案例,并据此展开讨论。

一、布鲁塞尔的语言

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历史,自14世纪以降不同时代统治者的语言(法语和西班牙语)、具有文化声望的语言(如18、19世纪的法语和20、21世纪的英语),以及当地基于荷兰语的语言变体或方言(Willemyns 2003),都一直保留沿用至今,共处一地。法语在社会文化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布鲁塞尔居于优势地位;荷兰语则多见于佛兰德斯这样的乡村或贫穷地区(与19世纪富裕的法语工业城市瓦隆相形见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弱小文化的语言,对提升社会阶层无益(参见 Mettewie & Van Mensel 2009)。

布鲁塞尔,全称布鲁塞尔首都区域(161 km²)^①在比利时的公共机构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半自治行政区域,官方使用双语制(荷兰语-法语)。与比利时的其他两个地区(佛兰德斯区和瓦隆区)一样,布鲁塞尔拥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和首脑。但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和文化等事务,则不归区域政府管辖,而由社区负责。

这意味着布鲁塞尔的行政事务是基于两个不同语言的平行体系运转的,一个使用法语,一个使用荷兰语。人们可自由选择他们希望加入的“语言群体”或“民族”,但只能二选一,比如当申请身份证或办理社会保险时,就必须在法语或是荷兰语的行政体系中做出选择。这种公共事务上的一分为二在教育系统和文化生活中也有所体现,许多大型文化活动和文化场所常常与语言社区关联并据此接受资助。另外,两个语言社区在政治和媒体领域的对抗也非常激烈(Sinardet 2012, 2013)。

这种双重组织架构与布鲁塞尔文化和语言上的多元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多元性来自数次的移民潮,包括工人、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难民以及近年来众多国际机构或私人组织雇用的外籍员工(Deboosere *et al.* 2009)。就像许多其他欧洲中型城市一样,布鲁塞尔正在经历日益多元化的移民潮,这个情况在未来的数十年仍将继续^②。然而,要获得布城语言构成的精确数据并非易事,因为比利时为防止造成政治冲突,自1947年之后就取消了人口普查中的语言调查并于1961年正式立法禁止(Witte & Van Velthoven 1998; Treffers-Daller 2002; Willemyns 2003)。不过在2000、2006和2012年布鲁塞尔曾有3个综合性调查研究(Janssens 2001, 2007, 2013),我们可以参考其中的相关数据。下表显示了这3年所记录的布鲁塞尔家庭语言使用的大致分类。

^① 《比利时宪法》。比利时众议院。条款3:比利时由Flemish区、Walloon区、Brussels区3个区组成。条款4:比利时由荷兰语区、法语区、布鲁塞尔首都双语区和德语区4个语言区域组成。URL: http://www.dekamer.be/kvvcr/pdf_sections/publications/constitution/grondwetEN.pdf (Last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17)。

^② 布鲁塞尔在21世纪也面临着人口暴增:2008年布鲁塞尔首都区登记的常住人口是1 048 491,但是据估计此数字到2050年会增加200 000(Deboosere *et al.* 2009)。这会给布鲁塞尔带来多方面的挑战,最显著的是住房、出行和教育。

表 1 布鲁塞尔家庭语言使用大致情况 (Janssens 2013)

| 语言 (混用) | 2000 年 | 2006 年 | 2012 年 |
|-----------------|--------|--------|--------|
| 仅法语 | 59.5% | 63.1% | 38.1% |
| 仅荷兰语 | 6.4% | 5.2% | 5.2% |
| 荷兰语-法语 | 8.0% | 7.2% | 17.0% |
| 法语-其他 (非荷兰语或法语) | 14.5% | 16.3% | 23.2% |
| 其他 | 11.6% | 8.1% | 16.5% |

表 1 数据清楚地表明, 在过去的 10 年中, 布鲁塞尔只使用法语的家庭数量已由 60% 左右降至 38.1%, 取而代之的是与荷兰语或其他语言混用。而这两种官方语言都不使用的家庭总计达到了 16.5%。2012 年, 法语仍然是布鲁塞尔家庭中最重要语言 (78.3%), 荷兰语比例勉强超过 20%, 近 40% 的家庭使用法语或荷兰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而 2000 年的数据为 26.1%)。另外一个可以反映语言多样性的指标, 是达到“好”或“很好”水平的家庭语言总体数量。与 2000 年的 72 相比, 2012 年的调查中这个数字达到 104 (Janssens 2001)。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出现 50% 的增长, 说明布鲁塞尔的语言多样化确实在近些年快速大幅增长。上述研究也显示, 法语仍然是布鲁塞尔主要的交际语, 但是英语也在逐渐攻城略地。基于此, Van Parijs (2007) 指出, 英语, 而非荷兰语, 正在成为布鲁塞尔的第二大语言。此说是否确切尚存争议^①, 但无论对错, 我们都可以说布鲁塞尔家庭语言的构成是相当多样化的。布鲁塞尔正日益成为多语化城市, 那种认为在各自特定区域分别使用两种语言的观点, 即使曾经正确, 也与当前现实大相径庭。

总的来说, 布鲁塞尔首都区域的政治机构是建立在双语制的基础之上的, 按照语言分野形成了二元政治组织架构。尽管其人口构成已经多语化了, 布鲁塞尔的媒体和政治公众话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两个“语言群体”掌控 (Sinardet 2012, 2013)。这一分野也适用于整个比利时, 流行文化和媒体普遍强调, 使用荷兰语的弗兰德人和使用法语的瓦隆人之间的对抗构成了比利时的根本政治动态 (Blommaert 2011)。这使得“Nederlandstalig” (讲荷兰语)、“Franstalig” (讲法语) 和“anderstalig” (讲其他语言) 等标签以及三者混用频频被用于人群分类。在比利时的荷兰语区, “讲其他语言”这种标签常常被用于指代所有说移民语言的人, 并且延伸 (或缩减) 到一些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中去, 而他们大多来自不那么富裕的社会经济阶层。正如 Blommaert (2011 : 1) 所言, 对于两大语言人群的聚焦 (实际上就是分而呼之) 是“比利时长久以来的语言意识形态冲突”的反映, 而同时将所有其他语言归为一个“其他”类别, 不仅使单语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也导致了对于语言和社会多样性的拒绝。

二、家庭语言政策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结合了语言习得研究和语言政策研究的视角, 探究“在家庭内部如何管理、学习和协商语言” (King *et al.* 2008 : 907)。家庭为多语儿童的语言习得和语言社交提供了重要的环境 (De Houwer 2004, 2007 ; Gardner-Chloros 2009)。King 等 (2008 : 907) 将家庭语言政策描述为“家庭之中成员间关于语言使用的明确公开的规划”。但是在许多家庭中, 往往没有或很少有明确而有意识的规划 (Fogle & King 2013)。这些家庭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语言政策, 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交谈予以落实。另外, 家庭语言具有动态性, 我们可以通过家庭语言使用探究代际之间语言迁移是如

^① 英语在布鲁塞尔是一种“中立的第三方语言”, 这种说法可以参见 O'Donnell & Toebosch (2008)。

何发生的,其中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作用不能被低估(Pan 1995; Luykx 2003, 2005; Gafaranga 2010; Fogle & King 2013)。最后,语言实践在传递特定的文化价值观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因此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不仅详尽描述了语言发展的各方面,也解释了其与身份认同的联系。

家庭语言政策的确立基于父母关于其所使用语言的形态(King *et al.* 2008; Spolsky 2004; Curdt-Christiansen 2009)。Kroskrity (2004)对语言意识的定义如下:

这些观念,无论是明确表达的还是在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对语言使用理性化零散的或“部分成功”的尝试;这种理性化常常是多维的,限于特定环境的,且必然是基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经历(Kroskrity 2004: 496)。

语言意识形态来自使用者的社会文化经历,并且受社会环境的限制,常常会同时有几个互相矛盾的语言意识形态并存,并相互影响(Kroskrity 2004; King *et al.* 2008; Van Mensel 2014; Curdt-Christiansen 2016)。有鉴于此,Trudell和Klaas(2010)和Zhang(2004)的研究表明,移民会有保持其母语的愿望,同时也希望能学会新环境中主体人群使用的语言。Tannenbaum(2012)将移民家庭中的语言政策视为移民对全新生活环境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感反应。比如,移民父母将母语视为与其祖国、家庭和身份的联系纽带,并且努力保护与之相关的自尊感。然而,他们也知道学会新环境中的语言具有潜在益处,比如为社会所接纳或者获得社会声望。Tannenbaum(2012)将这种母语保护的愿望称之为一种抵御机制,语言转用的愿望则为应对机制。这个理论与Curdt-Christiansen(2009, 2013)的发现相一致,她认为移民家庭的语言意识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因素紧密相关(亦见Kroskrity 2004; Spolsky 2004; Dumanig *et al.* 2013)。

语言管理是指父母期望或做出的一种或数种语言选择。Lanza(2007)将所有的这些选择称为“语言选择模式”(亦见Romaine 1995)。当父母说不同的语言时,一种常见的语言选择模式就是OPOL模式(一人一语)(参见Piller 2001; De Houwer 2009),每位家长原则上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孩子交流。虽然父母常被建议使用这种模式以避免对儿童的头脑造成“混乱”,但现有文献显示,这种模式在发展同步双语方面并不比其他模式更为成功。比如,一个在佛兰德斯所做的大规模调查研究(De Houwer 2007)显示,在使用OPOL模式的多语家庭中,3/4家庭的儿童会说少数语言。当父母双方都使用两种语言时,这个数字甚至还稍高一些。当父母双方都说少数语言时效果最好,97%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儿童会说少数语言;哪怕有一方父母同时使用学校的教学语言时,这一结果仍高达93%(De Houwer 2007: 419)。Yamamoto(2001,转引自De Houwer 2009)在一个稍小样本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父母使用当地语言或母语的频率及方式,也会影响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

家庭语言政策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比概括性理论模式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父母可能在对儿童使用何种语言方面有期望的语言选择模式,但是在日常交流中他们需要时时调整,尤其当孩子们不尊重他们的语言选择时。儿童并非总愿意说父母所希望的语言,很多只有在家中才能听到的语言正在流失(Pan 1995; Gafaranga 2010)。有鉴于此,Lanza(2007)总结了5种会话策略,当儿童使用一种并非父母所期望的语言交流时,父母可以在与孩子们对话中使用它们。这5种策略是最小理解力策略、表达猜测策略、成人重复策略、继续进行策略和语码转换策略。这些策略可以看成是单语环境到双语环境的连续统一体(Lanza 2007)。当我们沿着这个统一体过渡时,父母逐渐表现出他们能够明白孩子们说的“其他”语言。

最小理解力策略,是指父母假装并不理解孩子们说的内容,也不支持孩子所做的语言选择。表达猜测策略,是指父母尝试猜测孩子说的意思,孩子只需确认或否定。成人重复策略,是指父母重复孩子所说的内容,并不是作为问题来问,也不需要孩子确认。而继续进行策略是指父母继续交谈,对孩子表明其明白孩子所说的另一种语言并且可以容许两种语言同时使用。语码转换策略则指父母使用两种语言。

在一场对话中，父母往往会连续使用多种策略而不自知。根据 King 和 Logan-Terry (2008) 的研究，对于儿童“错误的语言选择”，父母主要使用继续进行策略和语码转换策略。有时候父母不可避免会混用语言或语码转换。因为绝对意义上的单一语言模式选择是不现实的 (Meng & Miyamoto 2012)。另外，对话往往是自发产生的，很多会话策略往往是无意识的，而非深思熟虑的行为。

三、多语家庭语言实践：三个案例研究

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会介绍 3 个家庭的多语实践案例，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语言背景，他们都决定对孩子进行双语教育。以下是 3 个家庭的简要介绍。

家庭 1

家庭 1 由一对说法语的夫妻组成，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入一所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父亲 Alain (38 岁) 和母亲 Béatrice (40 岁) 生长在一个主要讲法语的环境中，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研究期间，女儿 (Sarah) 7 岁，小学一年级；儿子 (Léo) 4 岁 5 个月，幼儿园第二年。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他们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从布鲁塞尔官方以及机构二元性的角度来看，Alain 和 Béatrice 在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体系中，是典型的“另类”代表：自小属于传统的两大语言社团之一，他们长大后选择跨越界限，进入代表着另一个传统语言社团的教育体系中。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被认为和 / 或归类为“说法语的人”，因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当前的语言使用、家庭语言背景、教育背景）显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法语社团。在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体系中抚育孩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社交网络。他们需要和使用荷兰语的门卫、家长、孩子进行接触交流，进而与孩子所就读学校的一些家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家庭 2

Ann (35 岁) 和 Ricardo (36 岁) 在西班牙相遇，当时 Ann 通过伊拉莫斯欧洲交流项目在西班牙学习。本研究进行期间这对夫妻的 3 个女儿分别是 6 岁、4 岁和 2 岁。Ann 和 Ricardo 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家庭语言背景几乎都是单语环境。Ricardo 在西班牙的巴亚多利德长大，那里只说西班牙语。Ann 来自布鲁日，属布鲁塞尔的荷兰语区，家中只讲一种荷兰语的方言变体。夫妻俩称，他们目前在家里遵循“一人一语”的原则，Ann 使用荷兰语而 Ricardo 使用西班牙语。他们双方从一开始相遇讲的就是西班牙语，直到如今。孩子们互相交流以及和母亲交流时讲荷兰语，与父亲交流则使用西班牙语。这种夫妻双方使用不同语言的背景使得他们面临一个特殊的状况，那就是布鲁塞尔以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体系需要大家讲荷兰语。Ann 应该属于荷兰语教学传统的目标群体，这一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语言维护系统，使得在“讲法语”的布鲁塞尔，她和她的孩子们能够维护和加强他们的母语。同时，他的西班牙丈夫是一个外来者，他使用的语言在布鲁塞尔的语言使用调查中被归类为“其他”语言。

家庭 3

第三个家庭是由母亲 Shu (32 岁)、父亲 Bei (32 岁)、两个女儿 Qi (4 岁 9 个月) 和 Lin (2 岁 4 个月) 组成。Shu 在比利时的官方荷兰语区佛兰德斯长大，而 Bei 是 2006 年才定居于此的。父母双方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在佛兰德斯的服务业工作。Qi 在上学前班，Lin 在上幼儿园。母亲 Shu 讲荷兰语、普通话和青田话（一种她与父母交流时使用的吴方言），还能说一些英语和法语。父亲 Bei 讲普通话，无锡话（吴方言的一种）和英语，并能够讲一点儿荷兰语。大女儿 Qi 能讲荷兰语、汉语和青田话，其中荷兰语是她最擅长的语言，而普通话和青田话仅仅是被动了解。小女儿 Lin 了解很多荷兰语词汇和少量普通话，荷兰语也是她最擅长的语言。

在这个家庭中，父母选择使用多语教育，教孩子们荷兰语和普通话。父母意图采用的家庭语言政策是 OPOL 模式的变形，母亲和父亲各自对孩子们讲他们的主要语言（分别是荷兰语和普通话），但是当所有家庭成员在一起时主要使用普通话。这种形式的语言政策清晰地表明父母支持维护自己的母语，当然也无意削弱所在环境的语言。

总的来说，如表 2 第二栏所归纳的，3 个不同的家庭可以代表布鲁塞尔公众话语中常见的几种“典型”的人群标签，这 3 个家庭在定量调查中会按照语言背景归入不同类别，具体可见第 3 栏。

表 2 3 个家庭父母可能归属的类别

| 名称 | 人群标签 | 语言背景 |
|------|-------------|-------------|
| 家庭 1 | 使用法语的布鲁塞尔人 | 法语-法语 |
| 家庭 2 | 混合佛兰德人-外籍人士 | 荷兰语-其他语言 |
| 家庭 3 | 中国移民 | 其他（荷兰语？）-其他 |

文中所用数据来自被调查家庭的父母在不同环境中亲自录下的音频资料。家庭 1 和家庭 2 历时两年，从 2010 年的 11 月到 2012 年的 9 月（Van Mensel 2014, 2018），家庭 3 则是从 2014 年 12 月到 2015 年 6 月（Van Mensel & Yao 2017）。下面的摘录是一个更大语料库中的一部分，更多详尽的观察实例可以参考 Van Mensel 和 Yao (2017) 关于家庭 3 和 Van Mensel (2018) 关于家庭 1 和 2 的记录。

（一）多语家庭语言实践：家庭 1

根据上文对家庭 1 中 Béatrice 和 Alain 语言使用行为的介绍，我们可以预计这两位父母与孩子交流时会基本使用法语一种语言。Béatrice 和 Alain 表示，他们与家人、亲戚和大多数朋友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法语，据说孩子们之间大部分情况下说的也是法语。Alain 所录下的大部分数据中，这种现象起初似乎得到了验证，他和孩子们全程都在用法语交流。但在一个较长的录音中，一个不同的复杂现象出现了。触发整个家庭法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变化的是 Alain 女儿的朋友 Emma。Emma 主要讲荷兰语。因为她的到来，这段录音里法语和荷兰语都有使用。下面的两段交流发生在音乐学校，先是 Alain 和女儿 Sarah 互相打招呼；接下来的是 Alain 和音乐教师对话，大家只使用法语。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音乐学校中使用最多的语言是法语，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大家都用法语交流，教师们也是单语-法语的使用者。一些孩子虽然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但是所有的课程使用的都是法语。

摘录 1

| | | |
|-------|---|--|
| Alain | soir! | （以下法语）晚上好！ |
| 教师 | bonsoir! | 晚上好！ |
| Sarah | dag papa! | （以下荷兰语）你好，爸爸！ |
| Alain | dag Sarah! tu prends ta veste? | 你好 Sarah! （以下法语）拿上你的外套吧？ |
| Sarah | pa, he ... heb je Chaise Musicale (a music CD) ... mag ik van voor? | （以下荷兰语）爸爸，你拿了 Chaise Musicale （一张音乐 CD）吗……我能不能到前排去拿？ |
| Alain | mag ik van wat? | 到哪里去？ |
| Sarah | voor. | 前排。 |
| Alain | voor wat? <laugh> | 哪里的前排 <大笑> |
| Sarah | maar voor, in de auto. | 前排，车的前排。 |
| Alain | oh, in de auto? euh, ik denk het niet, nee . | 哦，在车里吗？我觉得不在那里。 |

(续表)

| | | |
|-------|---|--|
| Sarah | jawel! | 在的! |
| Alain | tu me parles en néerlandais, toi, maintenant? | (以下法语) 你用荷兰语跟我说话? |
| Emma | maar allez alstublieft. allez please! | (以下荷兰语) 但是 allez (感叹词) 求你了 allez (感叹词) (以下英语:) 求你了! |
| Alain | @Emma: hoe was het Emma? ja? @ teacher: ça a été? | (用荷兰语向 Emma 说) Emma, 课上得怎么样? 挺好吗? (用法语向老师说) 课上得还好吗? |
| 音乐教师 | (法语) | (法语) |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 无论是音乐学校的语言机制还是 Sarah 与父亲讲话的语言习惯都没有阻止她使用荷兰语跟父亲交流。Alain 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明确地(用法语)问她为什么。她在荷兰语学校的朋友 Emma 促使 Sarah 两次用荷兰语继续交流, 可能是为了炫耀, 或者因为话题是关于坐车前排的, 因为对于一个 7 岁的孩子来说能坐前排是非常风光的特权。以下片段(摘录 2)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些对话发生在同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当时这群人开车到了 Emma 家门前。

摘录 2

| | | |
|-------|---|---|
| Alain | Arrête de toucher à tous ces boutons, je viens de te le dire. Ok? | (以下为法语) 别乱摸那些按钮, 行吗? 我才说过。 |
| | Ah Emma? Neem je je map nie? | (用荷兰语向 Emma 说) 啊, Emma? 你怎么不拿你的活页夹? |
| Sarah | Papa XXX met Emma naar hun huis en daarna kom ik terug naar ons. | (以下荷兰语) 爸爸……我跟 Emma 去她家, 然后再回来。 |
| Alain | Wacht. (...) Nee euh kom viens oui, oui ok. | 等一下。(……) 不行。呃, 回来。 (以下法语) 回来。好的, 好的, 去吧。 |
| Léo | En ikke! | (以下荷兰语) 还有我! |
| Alain | Neem je map mee. Euh...Sarah. | 带上你的活页夹。呃…… Sarah。 |
| | Et ta veste elle est où Léo? | (以下法语) 还有你的外套, 在哪里, Léo ? |
| Léo | En ikke ook!! | (以下荷兰语) 还有我! |
| | Par terre. | (以下法语) 在地上。 |
| Alain | Par terre. Mais prends-là alors. Qu'est-ce qu'elle fait par terre? Prends la veste de Léo, Sarah. | 在地上。那就捡起来。怎么会在地上? 带上 Léo 的外套, Sarah。 |

Alain 并未与所有在场的孩子一起交谈, 而是分别与每一位孩子单独交流。在前半部分所建立的语言使用模式似乎还在继续, Alain 跟 Emma 讲荷兰语, 跟自己孩子讲法语(并阻止了荷兰语单词时不时地介入)。Sarah 和 Léo 与父亲面对面交流时用法语, 但话题与 Emma 相关时用荷兰语(这与以往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稍微有些出入)。Sarah 用荷兰语说想在 Emma 家多待一会儿时, Léo 也用荷兰语的“还有我”去响应。这种使用荷兰语的策略是为了使得他与自己的姐姐保持一致, 以防被排除在外。我们不拟过多关注孩子们如何进行语码交替使用, 但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 荷兰语已经成为这个家庭语言库中的一个熟悉的部分。荷兰语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被触发, 并且与孩子们就读以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有关; 本例中的触发条件是 Sarah 讲荷兰语的同学 Emma 在场。以上摘录也验证了家庭语言政策领域其他

研究结果，那就是语言政策常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并且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持续地互相协调和调整（如：Alain 的反应“你用荷兰语跟我说话？”）。

（二）多语家庭语言实践：家庭 2

总的来说，Ann 和 Ricardo 所声称的家庭的语言格局（见家庭简介 2）得到了所录语料的证实。Ann 与孩子们讲（本地话）荷兰语，与丈夫讲西班牙语。Ricardo 用西班牙语跟女儿讲话，并且她们大部分情况下（习惯）用西班牙语回应，虽然不时也会夹杂荷兰语词汇。孩子们之间交流时说荷兰语。然而，当我们进一步研究他们交谈的录音时，一个更加复杂的状况出现了。

偶尔，Ricardo 也会在交谈中使用一些荷兰语词汇，有时候是因为他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西班牙语词汇，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Ricardo 有一次斥责大女儿吃饭时不停地说话，他使用了一个荷兰语词汇“babbelkop”（话匣子）来加强他的语气。过了一小会儿，Ricardo 谈及女儿的初级阅读课本，想说出书的标题（荷兰语）。

摘录 3

| | | |
|---------|---|---|
| Ricardo | Daniela, vamos a hacer . después un poco de ‘klik klak brouillé(?)’. o como es? euh boek-etje (sic) | （以下西班牙语）Daniela，我们过一会做一点那个“klik klak brouillé(?)”。怎么叫着？呃（以下荷兰语）booklet（书册，用错后缀） |
| Daniela | boek! | book!（是书！） |
| Ann | uw hui-uw huiswerk eh, Daniela? | 你的，你的作业（n.）呢，Daniela？ |
| Daniela | ha, die was ik al vergeten. | 啊，我都忘了。 |
| Ricardo | me ha dicho la maestra que tienes que aprender a leer un poquito más. | （以下西班牙语）老师说你要学着多读一点。 |

看到 Ricardo 对她的课本题目有些不太确定，大女儿纠正了他的发音，着重强调这个单词“书”，似乎在责备他的父亲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正确的词汇。Ricardo 使用的两个词（“babbelkop”和“boekje”）是他在家中听说过的荷兰语词汇，很可能来自他的妻子。在下面的摘录中，Ricardo 奖励了他的女儿 Isabel，积极地鼓励了她的某些行为。开始是用西班牙语，然后迅速用荷兰语重复了一遍，包括她的名字。

摘录 4

| | | |
|---------|---|---|
| Ricardo | voilà (interj., Spanish pronunciation) muy bien Isa! bravo Belleke! (school bell rings) oh Daniela, un beso . tienes que ir a tu clase, vale? te quiero mucho . aprende, hè? y concéntrate, vale? | （荷兰语，西班牙语口音）你做到了！（以下西班牙语）非常好，Isa！（以下荷兰语）干得好，Belleke！（学校铃响）（以下西班牙语）哦，Daniela，亲一个。你该去上课了，好吗？我好爱你。好好学习，好吗？认真听讲，好吗？ |
|---------|---|---|

跟其他例子一样，这个摘录中的荷兰语成分（鼓励“Bravo Belleke!”）是在西班牙语占主导的环境中使用的。Ricardo 表扬 Isabel 学会了某个特定的技能（即把书包放在了肩膀上）。有趣的是，这个鼓励的话语用两种语言展现了两次。第二个荷兰语成分很可能是来自母亲 Ann 跟孩子们交流时使用的语言，比如在女儿荷兰语名字后加后缀（表示对小孩子的昵称，如“Belleke”代替“Isabel”）。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例子中，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荷兰语为教学语言学校的操场）较适合父母和子女间使用荷兰语交流，故而 Ricardo 用荷兰语又赞扬了孩子一遍。这种解读，我们无法在已有资料基础上进行验证，但的确与我们的结论相吻合，即 Ricardo 运用了妻子的语言来实施某些言语行为。另外，这个摘录恰当地展示了家庭语言政策是如何在言语评价和鼓励中被强化的，再次强调了语言使用中情感的重要性。

(三) 多语家庭语言实践：家庭 3

家庭 3 的父母称他们与孩子们交流时使用他们的主要语言，而当家人都在一起时讲普通话。从录音中，我们了解到这对父母往往会保持这种语言选择。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会话的录音时，我们发现这个局面并非一直持续。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孩子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特定的策略来影响家庭中的语言选择（Luykx 2003；Gafaranga 2010, 2011；Fogle & King 2013；Van Mensel & Yao 2017），当其中一个孩子做出了一个“期望之外”的语言选择时，观察父母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以下摘录是在晚饭时录的音，显示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因为是所有家人都在一起，所以父母应该都是用普通话跟孩子交流的（见前文家庭 3 的简介）：

摘录 5

| | | | | | |
|----|----|--|----|----|---|
| 1 | ma | Liang ge ren, yi ge [ren, san ge ren? 两个人，一个人，三个人？ | 15 | qi | Lekker. 好。 |
| 2 | qi | [Mama::: mag ik patatje? 妈妈::: 我可以吃土豆吗？ | 16 | ma | Neng bu neng tuo_ ba baobao na xialai a?: 能不能脱——把包包拿出来啊？ |
| 3 | pa | Yi: ge ren dou bu dao! 一个人都不到！ | | | (0'2") |
| 4 | ma | Na jiushi de. Yi hui'r_ Rang baba jia gei ni ba. Ni rang ba_ 那好吧。等会儿，让爸爸给你再拿点。让爸—— | 17 | pa | Wo gen ta shuo le bu yao dai, ta fei yao dai. 我跟他说了不要带，她非要带。 |
| 5 | qi | Patatje:. 土豆:。 | | li | (哭) |
| 6 | pa | Ni yao shenme? *Pa[tatje*? 你要什么？ Patatje? | 18 | ma | Ni keyi jianjue bu gei ta dai a? 你可以坚决不给她带啊？ |
| 7 | qi | [Patatje. [土豆。 | | li | (哭) |
| 8 | pa | Ni yao bu yao zhege, zhege xiebang a? 你要不要这个，这个蟹棒啊？ | 19 | pa | Xing ba. 行吧。 |
| 9 | qi | Ja. 要。 | 20 | qi | Eneuh diteuh ook. 还有这个。 |
| 10 | li | Papa:. 爸爸。 | 21 | pa | Zicai ni ye yao a? 紫菜你也要啊？ |
| 11 | pa | Ni kankan, ni kan! 你看看，你看！ | 22 | ma | Bu yao a? 不要啊？ |
| | | (0'4") | 23 | li | Nee! (huilt) 不要！（哭） |
| 12 | pa | Xie_ 蟹—— | 24 | ma | Zo? 这个？ |
| 13 | qi | *Xiebangeuh* van mij? 蟹棒给我的？ | | li | (哭) |
| 14 | pa | Ni yao bu yao zhege? Zhege, ni chang yixia. 你要不要这个？这个，你尝一下。 | 25 | qi | [Genoeg. [够了。 |
| | li | (哭) | | li | (哭) |
| | | | 26 | qi | [En nu die eneuh ook die --(1 word)--. [这个不是那个，一个字。 |
| | | | | li | (哭) |

(续表)

| | | | | | |
|----|----|---|----|----|-----------------------------|
| 27 | ma | Na xing ba, ni ziji kanzheban ba a. 那行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 33 | ma | Slabbetje? 围嘴? |
| | | (0'4") | 34 | li | Ja! 是的! |
| 28 | ma | Qi, ni xian zuo hao. Baba hui gei ni jia de. Qi, 你先坐好。爸爸会给你夹的。 | 35 | ma | In de stoel? 在椅子上? |
| 29 | li | Mama, tjab. 妈妈, 围嘴。 | 36 | li | Ja! 是的! |
| 30 | pa | Lai, kuai, ok. 来, 快, 好。 | | | (0'1") |
| 31 | li | Mama: [tja:b! Mama::: tja:b! 妈妈: 围嘴! 妈妈::: 围嘴! | 37 | qi | Genoeg! 够了! |
| 32 | pa | [Ni yao bu yao *saus*? 你要不要“saus”(酱)? | 38 | pa | Ok, alstublieft. 好了, 给你。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话中孩子们一直用荷兰语回复。即使如此, 父母仍然坚持自己的语言选择, 并采用了继续进行策略。换句话说, 就是父母继续用汉语交流, 以此方式表明他们听得懂孩子们用荷兰语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 4 行和第 28 行的例子中, 对于大女儿在第 2 行和 26 行, 或在第 8 行和 12 行之间提出的要求, 母亲都给予了回应。父亲给女儿 Qi 夹螃蟹, 也反映出他明白她所说的话, 并让她自主做出语言选择。另外, 我们发现句内语码自由转换的例子(标注为*), 比如第 6 行父亲使用“patatje”(“potatoes”), 似乎是受第 2 行 Qi 使用的语言影响。父亲之所以说荷兰语“saus”(32 行), 有可能是他认为 Qi 不知道相应的中文。在第 13 行, 我们发现了整个语料库中 Qi 难得使用了一次汉语, 她对“蟹棒”的重复说明她有潜在的意愿去主动说汉语。当然另外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 她不知道蟹棒的荷兰语怎么说, 只好采用她父亲的词汇。最终, 父母有时也会使用荷兰语来回应孩子们。这点第一次出现在 24 行, 然后是 33、35 行, 当时母亲与小女儿 Li 交谈时转用了荷兰语, 显然是因为 Li 一直在哭, 而母亲希望通过使用 Li 习惯的语言来哄她继续吃饭。随后的交流也似乎影响了父亲, 因为他也开始用荷兰语来回应 Qi 了(38 行)。

总的说来, 我们可以看到观察结果显示家庭 3 的父母并不是一直应用他们“理论上”的家庭语言政策。相反, 父母有时会混用一些语言, 进行句内和句间的语码转换。然而, 这似乎并不影响孩子们的语言行为, 他们只是偶尔使用汉语。另外, 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话中, 当需要用汉语回应时, 父母往往使用继续进行的策略(更多例子可参见 Van Mensel & Yao 2017)。作为一种迁就, 父母允许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语言。这种状况并不特殊。比如, Gafaranga (2010, 2011) 也在布鲁塞尔的法-卢旺达双语家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 Gafaranga (2010) 和 Fogle (2013) 认为社会语言大环境的影响, 比如社会强势语言的地位, 可以解释这些现象, 但可能其他方面也会产生影响。Fogle (2012, 2013) 指出, 父母有对孩子进行双语教育的愿望, 有时候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来迁就孩子而增强情感的纽带, 这两种愿望之间可能产生冲突。Van Mensel (2018) 也提及“家庭语言库”, 其中的特定的词汇为所有亲属共享, 无论它们是否属于某种或其他语言, 比如前文摘录中父亲使用的“patatje”。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不考虑语言交流的背景我们就无法掌握其交流的实质: 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所有其他发生在家庭背景下的活动, 比如确保孩子们吃饭、刷牙等。相关例子可以在摘录的最后几行看到, 母亲用

荷兰语跟小女儿交流确保 Li 最终开始吃饭。

四、结 论

在本文中，笔者旨在详细呈现 3 个家庭的多语实践活动，他们都在布鲁塞尔及周边生活，各自有着不同的语言背景。而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首都，虽为官方双语制实际上是多语城市。这三个家庭在社会语言生活状况方面区别较大：家庭 1 是在使用人数和影响力上占优势的法语使用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这个城市中另一种有影响力的多数语言（荷兰语）。家庭 2 是语言混用的家庭（荷兰语-西班牙语）。他们将孩子们送到荷兰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目的是为了在“说法语的”布鲁塞尔维护和加强他们的母语，同时也希望将另一个母语（西班牙语）传承给孩子们。家庭 3 是一个移民家庭。他们希望能够在大多数人讲荷兰语的环境中保存其继承的族裔语（普通话）。根据观察，这些家庭的语言实践活动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点。所有的父母对于在家中应该使用哪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先称之为原定家庭语言政策^①，总的来说，这些语言政策都坚持认为应将不同语言区别开来，无论是在使用 OPOL 策略的家庭 2 和 3，还是在学校和家庭语言严格区分的家庭 1 都是如此。

然而，当我们研究这些家庭的语言实践时，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案例偏离了原定的语言政策，展现出一种实际语言政策。家庭 1 的家庭成员互相之间临时起意使用荷兰语（虽然不得不承认是因为女儿朋友在场的缘故），由女儿发起，父亲和儿子都会参与使用。在其他两个案例中（家庭 2 和 3），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语码转换的例子，大多是由父亲们发起，他们会从子女与妻子的语言词库中选取一些加入到自己的词库中。这些例子显示出现了一种初级的家庭多语混合词库（参见 Van Mensel & Yao 2017；Van Mensel 2018），其中一些特定的词汇是所有亲友所共享的，不管他们是否隶属于同一个语言。与单语家庭经历类似的是（见 Gordon 2009），家庭成员会部分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庭语”，家人可以通过共享这些语言来增进家庭纽带关系。前文所述的父母希望跟孩子创造情感联系的愿望（Fogle 2012, 2013），可以部分解释从家庭 2 和 3 观察到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家庭 1 中父亲和女儿决定相互之间用荷兰语交流，也是出于类似的创造情感纽带的愿望，虽然这一次甚至超过了家庭，是与女儿说荷兰语的朋友交流。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多语家庭，无论其语言背景为何，都会使用比他们自己声称的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此外，这些家庭的语言构成远比社会现有分类复杂和多样。如前所述，在布鲁塞尔甚至整个比利时，这些分类常常被简化为荷兰语、法语、“其他语言”或者上述分类的混合搭配，忽视了其他语言和社会多样性的存在（Blommaert 2011）。本文数据显示，当我们思考语言接触和多语家庭等问题时，应该谨慎对待文献中现有的分类方法。这些分类会不可避免地抹杀微观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如本文所展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看似是语言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 Blommaert, J. 2011. The long language-ideological debate in Belgium.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6 (3), 241-256.
 Curdt-Christiansen, X.-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

^① 除了本文所展示的部分访谈数据，本研究获得的其余数据显示，它也是一种明确提出（Shohamy 2006）的语言政策：对于家庭 1，见 Van Mensel（2016）；对于家庭 2，见 Van Mensel（2015）；对于家庭 3，见 Van Mensel & Yao（2017）。

- 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 (4), 351–375.
- Curdt-Christiansen, X.-L. 2013. Family language policy: sociopolitical reality versus linguistic continuity. *Language Policy* 12 (1), 1–6.
- Curdt-Christiansen, X.-L. 2016. Conflicting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contradictory language practices in Singaporean bilingual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 (7), 694–709.
- De Houwer, A. 2004. Trilingual Input and Children's Language Use in Trilingual Families in Flanders. In C. Hoffmann and J. Yt-sma (eds.), *Trilinguals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De Houwer, A. 2007. Parental language input patterns and children's bilingual us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 (3), 411–424.
- De Houwer, A. 2009.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ristol and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 Deboosere, P., T. Eggerickx, E. Van Hecke, and B. Wayens. 2009. The Population of Brussels: A Demographic Overview. *Brussels Studies, Citizen's Forum of Brussels: Synopsis nr. 3* (1), 1–18.
- Dumanig, F. P., M. K. David, and F. P. Shanmuganathan. 2013. Language choice and language policies in Filipino-Malaysian families in multilingual Malaysi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4 (6), 582–596.
- Fogle, L. W. 2012. *Seco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Learner Agency. Adoptive Family Talk*.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Fogle, L. W. 2013. Parental ethnotheor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transnational adoptive families. *Language Policy* 12 (1), 83–102.
- Fogle, L.W. and K. King. 2013. Child agency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9, 1–25.
- Gafaranga, J. 2010. Medium request: talking language shift into being. *Language in Society* 39 (2), 241–270.
- Gafaranga, J. 2011. Transition space medium repair: language shift talked into be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1), 118–135.
- Gardner-Chloros, P. 2009. *Codeswitch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C. 2009. *Making Meanings, Creating Fami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nssens, R. 2001. *Taalgebruik in Brussel. Taalverhoudingen, taalverschuivingen en taalidentiteit in een meertalige stad*. Brussels: VUB Press.
- Janssens, R. 2007. *De Brusselse taalbarometer*. Brussels: VUB Press.
- Janssens, R. 2013. *Meertaligheid als cement van de stedelijke samenleving*. Brussels: VUB Press.
- Janssens, R. 2015. Language conflict in Brussels: political mindset versus linguistic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35, 53–76.
- King, K. A. and A. Logan-Terry. 2008. Additive bilingualism through family language policy: strategies,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al outcomes. *Calidoscopio* 6 (1), 5–19.
- King, K. A., L. Fogle, and A.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 (5), 907–922.
- Kroskrity, P.V. 2004. Language Ideologies. In A. Duranti (ed.),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Lanza, E. 2007. Multilingualism in the family. In P. Auer and Wei Li (eds.),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uykx, A. 2003. Weaving languages together: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gender socialization in bilingual aymara households. In R. Bayley, and S. Schecter (ed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Societi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Luykx, A. 2005. Children as socializing agent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situations of language shift. In J. Cohen, K. T. McAlister, K. Rolstad and J. MacSwan (eds.), *ISB4: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Somerville: Cascadilla Press.
- Meng, H. and T. Miyamoto. 2012. Input and output in code switching: a case study of a Japanese-Chinese bilingual infa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5 (4), 393–415.
- Mettewie, L. and L. Van Mensel. 2009. Multilingualism at all costs: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needs in business in Brussels. *So-*

- ciolinguistica* 23, 131–149.
- O'Donnell, P. and A. Toebosch. 2008. Multilingualism in Brussels: 'I'd rather speak English'.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9 (2), 154–169.
- Pan, B. A. 1995. Code negotiation in bilingual families: 'my body starts speaking English.'.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6 (4), 315–327.
- Piller, I. 2001. Private language planning: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Estudios de Sociolingüística* 2 (1), 61–80.
- Romaine, S. 1995. *Bilingualism*. Oxford: Blackwell.
- Shohamy, E. 2006. *Languag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 Sinardet, D. 2012. Le rôle des médias dans le conflit communautaire belge: le traitement du dossier Bruxelles-Hal-Vilvorde lors des débats politiques télévisés francophones et néerlandophones en Belgique. In J. Perrez and M. Reuchamps (eds.), *Les relations communautaires en Belgique: approches politiques et linguistiques des relations communautaires en Belgique*. Louvain-la-Neuve: Academia, 105–132.
- Sinardet, D. 2013. How linguistically divided media represent linguistically divisive issues. Belgian TV-Debates on Brussels-Hal-le-Vilvorde.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3 (3), 311–330.
- Smith-Christmas, C. 2016.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aintaining an Endangered Language in the Hom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nenbaum, M.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s a form of coping or defence mechanism.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 (1), 57–66.
- Treffers-Daller, J. 2002.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Brussel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3 (1&2), 50–64.
- Trudell, B. and A. Klaas. 2010. Distinction,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motivations for local language literacy in senegalese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0 (2), 121–129.
- Van Mensel, L. 2014. *Language Labels, Language Practices. A Multiple Case Study of Parents with Children Enrolled in Dutch-medium Education in Brussels*. Namur: University of Namur Dissertation.
- Van Mensel, L. 2015. Children and choices. The effect of Macro language policy on the individual agency of transnational parents in Brussels. *Language Policy* 15 (4), 547–560.
- Van Mensel, L. 2016. Being a francophone parent in Dutch-medium education in Brussels: a tale of tensions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 *Minorités linguistiques et société* 7, 195–211.
- Van Mensel, L. 2018. Multilingual family practices: an interactional study. In G. Caliendo, R. Janssens, S. Slembrouck, and P. Van Avermaet (eds.),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Practic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expected 2018.
- Van Mensel, L. and L.-H. Yao. 2017. "Ni yao shenme? patatje?" gezinstaalbeleid en meertalige praktijken in een Chinees migrantengezin. *TNTL*.
- Van Parijs, P. 2007. Brussels capital of Europe: the new linguistic challenges. *Brussels Studies* 6.
- Willemyns, R. 2003. *Het verhaal van het Vlaams.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Nederlands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Antwerpen: Standaard Uitgeverij.
- Witte, E. and H. Van Velthoven. 1998. *Language and Politics. The Belgian Case Stud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ussels: VUB Press.
- Zhang, D. 2004. Home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19 (2), 33–53.

责任编辑：丁海燕